

巴金全传

修订版
[下卷]

陈丹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全传

修订版
[下卷]

陈丹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五编

“天堂”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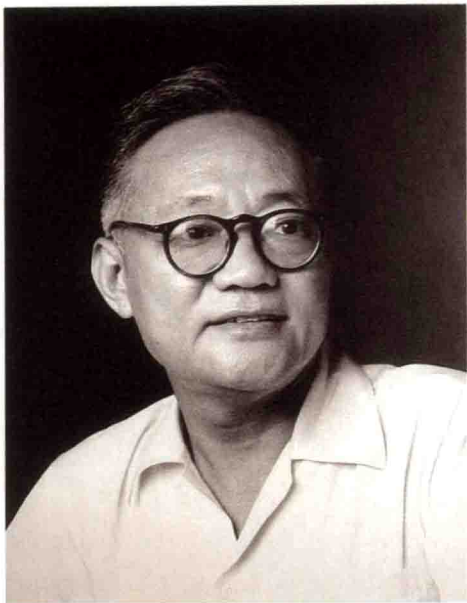
(1957—1965)

第十四章

扭曲之梦

134. 在陷阱中挣扎(一)

从乍暖乍寒的早春天气，到气温似乎渐渐升高，人们开始解除顾虑，讲出一些心里话。文学界中的青年作家也像其他领域的青年人一样活跃起来。他们有更多的幻想，想做更多的事。他们很想听听自己尊敬的老作家的意见，这样有助于自己的思考 and 实践。巴金和章靳以、孔罗荪访问丁玲时，听她赞扬过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巴金这时也连续接待过一些青年作家的来访。像白桦、方之、陆文夫等等。方之、陆文夫是江苏省刚刚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几位意气相投，正在酝酿创办一个青年刊物，名字也想好了，叫《探求者》。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功夫。巴金的文学生涯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他当然很理解，也很赞成。但是，即使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根据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巴金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能允许办同人刊物吗？他们太单纯了，想得太简单了，会不会招来什么麻烦呢？但他又不便直截了当劝阻他们，只好很委婉地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但不知道他们听懂了他的意思没有。



“文革”前夕的巴金

1957年4月9日,《文汇报》刊出了周扬答该报记者问,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开始整风。同时报道《没有大“放”的原因何在?上海文艺界巴金等人对领导提出批评》的消息。……从5月到6月上旬,各地党报、领导人

都在热心地鼓动人们鸣放,帮助党整风。文艺界包括中国作协也连续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作家艺术家的意见。

就在人们真诚地热情地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不到二十天,5月15日,毛泽东悄悄地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共产党的高层中秘密传阅。他在文章认为“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毛泽东在这里情不自禁地大肆赞扬了教条主义,然后却极为严厉地强调,“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他对这个时期的鸣放定性,归结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毒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毛泽东的仇视和愤怒溢于言表,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打翻在

地。他还对右派的人数作了估计（也可以说是规定、指标），“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至于反右派斗争的具体方法，毛泽东也有设想和安排。譬如：“钓鱼”、“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等。在他稍后写的一个党内指示中，他指示机关、学校、工厂对右派分子的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演讲，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①

读毛泽东在这时期写的文章，人们会被他那种强烈地渴望反击的狠劲所震惊；就像3月时，人们听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他的谈笑风生、真心诚意鼓动鸣放而折服一样。那时他说：“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儿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党外人士不过在会上、在报上战战兢兢、和风细雨地说了一点意见；如今反过来，对付提意见的人却是暴风骤雨、大小会批斗，当作阶级敌人全民共讨之，最后降级、开除、劳改、倒霉一辈子。由此想到一年多前毛泽东强调过十五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这才是他的真实的认识和看法。后来所谓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双百”方针的提出，不过是形势所迫、权宜之计而已。

一切都按毛泽东所策划和导演的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6月8日，这场反右“大战”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开锣登场，由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大幕，接着连续发表社论、各界人士谈话、批判文章和批判会的报道……毛泽东亲自撰写许多文章参战。文学界则以中国作协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来扭转局面，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如果借用毛泽东当时形容“右派”进攻的话来形容反右派真是最确切不过：“一时好似天昏地暗……”

^① 引文均见《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引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3—429、431—43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这样一个惊心动魄、诡谲多变的政治气候，对于巴金来说，是他以前几十年的生涯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真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和转折。就在《人民日报》吹响反右派斗争号角后的一个多星期，6月17日，巴金奉命匆匆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住在前门饭店，与四川代表、老友沙汀同室。斜对门住着上海代表、《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林放），时有往来和交谈。这次会议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直到7月20日才回上海，开得巴金在给萧珊的信中叫累不止，叫苦连天，这是过去许多次开会从未有过的。

这次大会几乎就是一次高层次的反右派斗争会议，各小组会捉对儿厮杀。譬如巴金所在的四川小组中有大右派章乃器。但是章乃器根本不到会。人们照样按照上面布置，有组织地进行猛烈地攻击。6月27日，巴金给萧珊写信说：“这次开会的确比往年忙，上午下午都开会，小组会开得多。章乃器也在四川小组，但是他根本不来开会。我一天弄得精疲力竭，晚上还有朋友来谈。……我也真想休息一个时候……我打算会后休息两天。好好睡半天觉。”6月30日的信中又说：“睡眠不够，大家都觉得累。……生活的确忙乱，思想也不集中。会开得很好。”这个时期巴金给萧珊写信很少谈会议情况，这是少有的一笔。7月8日信中又说：“我们一直忙着开会，白天整天开会，晚上或参加晚会或有人来聊天。晚睡早起，一天至多睡六个钟头，疲乏不堪。”7月12日信中说：“每天都是如此，肉体与精神都相当疲劳。”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到“作协反右派斗争很紧张”。

显然，巴金在这一个多月的会议生活里几乎是一种煎熬。他听人们没完没了不断重复那些揭发批判，他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只见有的人夸夸其谈，有的人义愤填膺，有的人虚与委蛇，有的人空话连篇……总之人们都在“深刻领会”领导意图，揣摩当时风向变化，然后表态发言，“要啥有啥”。譬如说，如何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深刻教育，得到了巨大的收获等等，诸如此类。上面也就心满意足，大胜而归。

巴金从来不喜欢开会，1949年前几乎不开会，这些年来偏偏掉在会山会海里面，眼睁睁地看着时光叹息地流逝而去。对他这个从来勤奋、珍惜光阴的人来说，无异于是对生命的虚掷甚至是虐杀；何况这种紧张可怕的批斗会

更是他不习惯以至恐惧的。他一生主张要善待人，要爱人，讲人道，讲人情，如今却要凶巴巴、恶狠狠地去批判、攻击、辱骂别人，他内心里有说不出的烦恼和反感，但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听会。于是他只能采取混会混时间的办法。当轮到他不得不讲时，他就按照报纸说一通空话、套话，这个本事他也开始学会了。

这场反右派斗争是巴金从未想到过的，也是任何人都不曾想到过的，即使那些本来心存疑虑的人也不会想到招来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祸及成十上百万人以至国家的命运的政治运动。巴金从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上感到气氛骤变，无所适从；但到了北京参加会议，才真正感受到可怕的政治压力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头上。他看到听到报上会上批判的那些所谓右派言论，就不能不联想到自己前些时候写的杂文、讲过的话，也都是类似一些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不照样可以归入为右派言论吗？想到这里，他开始坐卧不安，他紧张害怕，不知前面的命运怎样，别人将会怎样处置他，是不是会把他揪出来大会批小会斗，发动文学界和读者都来批斗他。

就在这时，《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女记者浦熙修到前门饭店来采访他，约他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而且催得很急，尽快用电报传送到上海去。这在《文汇报》来说，也许是一种急于应变的措施，但也是贯彻上面所谓组织左、中派人士写文章反右的要求。巴金不知道上面把自己看成什么派，但却可以借此表态，保护自己，所以一口答应，当天就写好不到一千字的短文交给记者，第二天（6月21日）就在上海《文汇报》上刊登出来，题目叫《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文章歌颂了毛泽东，批判有些人“欣赏毒草，迷恋剥削”，“他们就成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在文章中并没有使用“右派”这个词，说明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表表态，在那时似乎是无伤大雅的。紧接着《人民日报》也来约他写稿，当然要求态度鲜明尖锐。这次他是轻车熟路，更是一挥而就，随即于6月24日刊出，题目叫《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尽管还是重复一些天天充斥在报纸上的骂人的空话，但这次不仅不回避“右派”两个字，调门也大大地提高了。



这是反右派初期，巴金在几天之内在几家大报公开亮相的情况，但并没有使他感到轻快。瞬息变化的时局使他更加迷惑不解。那位《文汇报》女记者浦熙修在约稿后不到十天，就被《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作者毛泽东）点名“是一位能干的女将”，是右派中的“两帅之间还有一帅”。这使巴金吃惊不已。巴金思想混乱极了，他哪里分得清谁是右派，谁是左派。他眼中看到的是，许多他所熟悉的朋友，都是一些有才华、要求进步的好人，但却一个一个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7月14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巴金进入会场时，看见老友萧乾很沮丧地坐在后排。因为他已被《人民日报》点名为右派了，有些熟悉的朋友见到他装作没有看见远远躲开了。巴金却像平时一样坐到萧乾旁边劝慰他：“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这对身处逆境的萧乾是很大的温暖，因此铭记在心。后来周恩来招呼巴金坐到前面去，巴金一边向周恩来致意，一边仍不放心地叮嘱萧乾“要虚心，要冷静”。

住在斜对门的《新民晚报》赵超构原是一个谈笑风生、豁达开朗的人，这几天巴金却看不到他的笑容，显得心事重重，沉默寡言。他是一位杂文家，前些日子鸣放不少。巴金这时自己很紧张，却也很为他担心，又不便问他什么。过了几天，巴金重又听到了熟悉的笑声。因为他得到了上面的暗示，只要认真检讨就可过关。他马上写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传送到上海，第二天在他主持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而过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分化策略的体现，但却使巴金看得眼花缭乱。

章靳以从上海寄来《〈收获〉发刊词》，说是要征求编委意见。其实就是临时要加上毛泽东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巴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似乎看到了头上悬着一把可怕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不免又添了一分烦恼。

在这个冗长的会议期间，只要有空隙时间，他就去看望朋友；也只有和朋友在一起时才感到轻松一些。他与曹禺常见面，他去探访沈从文、顾均正……

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他特地到冯雪峰家去探望。冯雪峰在前几年因

《红楼梦研究》一事受到挫折，如今处境仍还不好。他是个资深的老党员，参加过红军长征，但还是书生气很重，容易动感情。老朋友见面，还是那样无拘无束，敞开心扉。巴金很尊重这位老党员，聊天时就把这些日子疑惑不解的问题说出来，向他请教。其实冯雪峰又比他多知道什么呢？但是他还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想象这次运动不会伤害太多的人。他努力解释一番。他和太太殷勤地拉着巴金到华侨大厦的大同酒家吃饭。冯雪峰平时生活简朴是有名的，很少下饭馆。如今做东道主拿着菜单不会点菜。巴金无论如何不曾想到厄运已经逼近他的朋友，下次再见时将是另一番情景了。

135. 在陷阱中挣扎(二)

二十多年以后，巴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止一次地说：

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

1956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

那时，他确是怀着一颗“战栗的心”，“整天提心吊胆”，“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①。巴金开完全国人大会后，回到上海也一样不轻松，继续陷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右会议中。从8月16日至9月3日，上海市举行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就叫《深入

^① 《再思录》第10页；《随想录》第705、704页。



反右派斗争，开展全民性整风》。原来说是整共产党的风，刚刚开了头，就变成要整全国老百姓的风，并称各民主党派各界各阶级各阶层“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人大成了斗争会，巴金参加了和周而复、柯灵、章靳以、郭绍虞等的两次联合发言，其中有一次就是批判复旦大学教授、诗人孙大雨。对于这样的事情，巴金已经来者不拒。其实他何尝了解孙大雨。他是上海作协主席，不能像开全国人大那样只是听会，现在不仅要主持会议（尽管只是个摆设，实际都是由作协党组操办的），还得讲话。这时由他挂名主编的《文艺月报》的一位副主编王若望也被揪出来批斗了。

在这些日子陆陆续续传来的消息中，他熟悉的亲近的朋友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的，在北京除了萧乾，还有冯雪峰。浙江有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曾是新四军老干部的黄源。不久前与他一起到四川视察的宋云彬。江苏有访问过他的方之、陆文夫。上海还有给平明出版社出过巴尔扎克译作的傅雷。曾是他三哥的学生，后来是他家的常客的黄裳。给他画过像的画家俞云阶……

在那动辄得咎、随时可能挨批的情况下，他平时对青年读者最为亲切、友好、尊重的习惯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他过去对读者来信几乎是每信必复的，五十年代忙乱的情况下，即使自己没有时间，也要请萧珊帮忙代复、代为处理。现在他被惊吓住了。有一封重庆的学生团体来信，请他为他们的刊物题词，他对萧珊说：“不回信也好。现在情形复杂，青年学生中间，有些人也有问题，尤其是要办刊物的，所以我以后也得当心。”

这时，在北京的中国作协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对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斗争。从1957年6月6日起到9月17日，借反右派斗争之风，连续开了二十七次党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由二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发言的多达一二百人，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批判斗争会。不仅会内批，还组织左派、中间派人士写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互相配合，以壮声势。巴金虽然身在上海，但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又是上海作协主席，又是知名度很高的大作家，当然不会被放过，也照样被组织写文章参加斗争。他按照当时的口径写的文章题目是《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发表在8月31日《人民日报》上，实际上他对这些斗争的是是非

非又了解多少呢！

9月12日，巴金和章靳以等人应命又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阶段，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包括像巴金、章靳以这样非党的或刚入党的知名作家登台亮相，面对面地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既是考验他们的立场是否鲜明地站在党的一边，又是增加批判的分量，壮大声势。

9月16、17日连续召开的会议已扩大到各省市区宣传部、作协负责人，参加者有一千三百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巴金到会场时，已经坐了许多人，他看见冯雪峰坐在前边，低着头，那副沮丧的神情是巴金认识他二十年来从未见过的。这样熟悉的、倾心相交的老朋友，从来被他尊敬的一位平易近人的党员，一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一个多月前，他们还在一起吃饭，敞开心扉聊天，还向他请教反右派是怎么回事，如今一下子他就变成了反党分子。巴金读到过《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报道，说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还有“反动的社会思想”等等耸人听闻的可怕罪名。巴金不忍心看他也不敢看他。他多么想和他谈谈，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的冯雪峰又是多么需要朋友的帮助、理解和辩护。但是在这样的气氛、这样的场合，不仅没有这个可能，而且还要成为批判者去无情地面对面对他，这是巴金五十多年人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

17日，巴金上了台，是作为和章靳以的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斗丁玲、冯雪峰、艾青……并且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大会。中宣部主要领导陆定一、周扬都作了长篇总结性的讲话。郭沫若也讲了被认为“语重心长，很有革命热情”的话。巴金和章靳以的联合发言，模仿着人们的调子，从报纸上拣了一些材料编成批判稿，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峰“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联”……巴金本来说话有点口吃，这时念稿子更是结结巴巴。他只想早点结束这个发言。虽说他不善言辞，但也从来没有像这次说话那么艰难。这样也就没有逃过主持会议的领导的法眼。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在日记里点评当时会场的情景：“茅盾讲了好久，约一个半小时，巴金只十多分钟……老舍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语言新鲜，意见尖锐，只多



少有些油滑之处……”^①

二十多年后，巴金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只是跟着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1957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②

人们熟悉《圣经》里的故事，常常可以看到那时候的人喜欢用石头做武器去打自己痛恨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帮人捉了一个犯了淫罪的妇人送到耶稣面前，问该怎么发落。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耶稣开始不理他们。后来一再逼问，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听了这个话，人群中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只剩下那个妇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是，1957年的情况是，人群都在向那“罪人”扔石头，要砸死他。人们都要借此表白自己是清白的，忠诚的，很革命的。上帝不仅不那么通情达理、宽容智慧，反而成了发起、组织、鼓动、驱使众人对着无辜的人去扔石头。巴金在回忆往事时多次借用“扔石头”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也是人群中的一个。

反右派斗争把成十上百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当作反动的敌人对待；同时也迫使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去批斗自己的同志、朋友、亲人，从而造成人格上、道德上的一次大缺失。中国作家协会本来应该是作家自己的团体，是为作家服务的作家之家，是作家谈文论艺、文化气氛浓厚的场所，现在却变成作家整作家、作家互相残杀、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的屠场。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内不过二百人左右就揪斗了右派数十个，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悲剧。因此这次反右斗争挑起的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相残杀，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政治上、精神上都是一次大劫难、大虐杀、大悲剧。巴金当然也是在劫难逃。

① 《郭小川1957年日记》第19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随想录》第158页。

1949年革命胜利后，中共领导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清除了殖民地的污垢；初期的俭朴廉洁的作风也颇得老百姓的好感。因此巴金也是心悦诚服的，并且用行动、写作一再表示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接受新思想，写出新作品，歌颂新社会。他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还由于胜利、成就在被广泛承认、接受的同时，也为虚伪的宣传夸大、渲染、神化了领袖和政党的作用，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渴望、崇拜、迷信好皇帝是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如今在造神运动的灌输下，人们更是把一切归功于“神”，一切听命于“神”，把自己也奉献在祭坛上。一切都是在崇高、神圣的革命的包装下推出的，必须相信而不容怀疑。巴金说到反胡风时的情况，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冥想”。^①所以，共产党号召整风，向党提意见，你心存疑虑也得响应；共产党要反右派，你不愿意也必得揭发批判别人。反正党永远是正确的，只能听党的话，响应党的号召，否则就会引火烧身。多年来，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凡“不安分”的人，就有可能遭到惩罚，在机关、学校、街道、家庭……所有的空间里，形成一个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局面，连自己也得否定自己，羞辱自己是狗屎堆，是敌人，是罪人。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压力，这种诬陷、编造、挖个人隐私、揭历史老底的手段和话语暴力的杀伤力，甚于刀锯斧钺，使人的尊严和人格被践踏到荡然无存，使人不能不由恐惧变为驯顺。巴金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和别的知识分子一样，从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渐渐地变成了精神奴隶。

于是，他就积极表态，写了好几篇杂文，如《惨痛的教训》《国土论》《戴帽子》等。这些文章并不完全像前几篇那样出于被迫或强派的任务，不免有主动迎合之意，“努力扮演反右派战士”，因此弄脏了自己的手，而这正是权势者所期望的。他对所谓知识分子不好好改造堕落成右派作了尖锐的分析和

^① 《随想录》第884—885页。



批判,还鼓吹上面定的调子,说右派“造反”,说“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很远’”。“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放松这一件事,认真地改造自己。”“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我们跟右派斗争,同时也在扫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种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但这是必要的。”^①他在这些文章中也点了许多正在被斗的右派的名字和言论,甚至没有忘记捎带批一下冯雪峰、丁玲^②。巴金说:“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他(指赵超构)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③

当然,这几乎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后的心理状态。至于巴金,1949年后那些接二连三加诸于他头上的政治头衔、身份,既是对他的重视和信任,也是一种精神上人格上的束缚。他虽不是归属于哪个单位编制中领工资的一员,但他作为中国作协、上海作协的领导人之一,他就不能不顾及这些单位对他的要求和安排,不能不当作任务,当作应尽的必须做的责任,以至连报刊约稿都当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是个很照顾别人、顾全大局的人,现在还是一个听党的话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记着别人对他的善待。

所以,中国作协开了二十七次批判丁陈的大会,作为副主席能不表示支持?全中国都在反右派,作为上海作协主席能不主持会议、讲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人大代表,在这些人大会揭发批判右派时能不一起参战呐喊(包括联合发言)?其次,巴金也看清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知识分子的处境,自己的言论和杂文并不比已揪出来的右派差多少,时时怕被人“当场揪出来”^④,到那时,妻子、儿女,整个家都将受到牵连而坠入苦难的深渊。想到这里,他不能不扔掉独立思考、大胆、为真理而敢想敢说……违背自己的信念,走

① 《文汇报》1957年7月24日。

② 《解放日报》1957年9月12日。

③④ 《随想录》第704页。

上一条失去自我、俯首为奴的泥泞的路。

就在北京登台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的日子里，巴金接到萧珊从上海寄来的信，告诉他，家中的花园里，“今天桂花开始开了，金桂银桂都绽出几朵花来，只是靠秋千的那枝依然故我。你回来之时，当然满园芳香了”^①。

然而，巴金哪还有心思赏花。文学界的朋友已像百花凋零，自己正在参与摧折香花，那份无法言说的难堪和悲哀，只能深埋在心里，即使对于自己的妻子也不便尽情倾诉。

136. 天堂之梦

当政治运动的硝烟稍稍散去，1957年11月初，巴金又作为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团长刘宁一，副团长钱俊瑞、许广平、老舍、梅兰芳、钱三强等。这个信息表示上面对他仍还信任，虽然他也发表了一些杂文和言论，却得到了宽恕。

这时毛泽东也去苏联。因为这几年发生了批判斯大林、波匈事件后，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许多矛盾，中苏两党也有严重分歧，毛泽东应赫鲁晓夫之邀，借庆祝典礼的机会商谈有关重大问题。

巴金还没有敏感到个中秘密。他还像以前那样热烈歌颂苏联。这是他第四次访问苏联了。他说：“哪怕听见人谈起莫斯科的大雪，我也会感到春天的暖意。”他对苏联友人说：“人到了莫斯科会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就像一滴水放进了海洋一样。”后来，他在散文中还赞颂说：“莫斯科的确是世界的中心，苏联的确是进步人类的大家庭。”当然，这些近乎谀美之词也是有所依据。毛泽东在莫斯科几次讲话的调子就高得很，再次强调：“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②

① 《家书》第25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第1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版。